

丹珍草 著



WENBEN TIANYE WENHUA

DUOCHONG SHIYU XIA DE ZANGZU WENXUE YANJIU

文本·田野·文化

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914-1

丹珍草
著



WENBEN TIANYE WENHUA
DUOCHONG SHIYU XIA DE ZANGZU WENXUE YANJIU

文本·田野·文化

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田野·文化：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 / 丹珍草著. —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

ISBN 978-7-5145-1242-7

I. ①文… II. ①丹… III. ①藏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9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7329 号

文本·田野·文化：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

丹珍草 著

责任编辑：张洪雪 孙兴冉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5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上 编

生活在别处	
——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	3
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写作的“身份焦虑”	19
“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阿来的诗》	36
传统与现代	
——读现代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	54
自然地理的文学发生学意义	
——以阿来的文学创作为例	68
母语思维与汉语叙事	
——《尘埃落定》的“第三空间语言”特征	80

中 编

当代藏族母语文学调查	109
走进英雄故里 ——德格县格萨尔文化遗迹与传说调查	148
德格县格萨尔史诗文化背景调查	159
格萨尔故里行 ——《格萨（斯）尔》学术考察	167
附一 湖北省长阳土族自治县“都镇湾故事”传承人调查 ——以十五溪村故事为个案	174
附二 土族“纳顿”会仪式的传承与变迁 ——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纳顿”会仪式调查	187

下 编

格萨尔史诗说唱与藏文化传承方式	209
格萨尔史诗文本的多样性流变	223
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类型寻绎	238
刻印在藏族人心中的“八宝祥徽”与“五妙欲”	251
古格王朝的覆灭与传教士	260

上 编



生活在别处

——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

一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迅猛推进的时代，很多人都免不了要离开家乡，到别处生活，甚至飞越千山万水，移居异国他乡。无论是在陌生的地方辗转奔波，还是迁移家园，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差异性的困扰，如自然环境的差异、社会环境的差异、民族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文化心理的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地域归属感、乡土本位意识，等等。差异越大，适应越难。而且，移居者或多或少都会面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与困惑，经受生存不确定性的焦虑和精神的漂泊。身份认同反映了对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的追寻，牵扯了他者与自我的复杂纠葛以及无处不在的矛盾。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是做一个不断挣扎的原汁原味的格格不入的移居者，还是改变自己的习惯和价值观，积极弥合差异，做一个融入者？是逃离还是坚守？

生长于川西北藏区的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工作，定居北京，后来去了拉萨。从1998年发表《绿波带》开始，吉米平阶陆续写出了一批反映北京藏人生活的小说，后来结集成小说集《北京藏人》出版。可以说，吉米平阶是反映藏人在都市生活的第一人，他以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的亲历者、创作者的身份展现了生活在陌生都市里的藏人的生活

情态，反映了处在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夹缝中的藏族青年的生活处境，用文学形象展示了“异乡人”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北京藏人”系列小说主要写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的藏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从小在藏区长大的，因为读书之类的机会来到北京。从藏区乡土文化圈进入北京都市文化圈，必然要面对各种差异以及诸多陌生的关系，有适应，有不适应，有冲突，有融入，有迷惘与烦恼，也有喜乐。处在藏汉两种文化“边缘”的都市藏人始终都是北京主流社会中的“他者”。北京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京藏人在融入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时，除了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和惶惑，还要学习怎样与汉文化相处，以及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他们切身感受着不同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冲击面前，他们常常感到无力、无助、无奈，但生活又不允许他们顾影自怜，于是他们就有了许多愿望，于是他们也有了许多尴尬。

中篇小说《绿波带》中，一个叫次仁的藏人，在现实的双重生活中感受着极为强烈的孤独，在都市生活圈里，他活得极其疲惫混乱。刚到北京的次仁，给人的印象是整天迷迷瞪瞪的，一副茫然的样子。《绿波带》开篇写道：“次仁又在犯那个老毛病了。他头脑发懵思维暂停两眼发直血压上升，怔在街中央的安全岛里。”次仁“觉得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在瞒着他。那些极常识的事情他全不知道，而这总是人人都知道的”^①。除了陌生感，就是各种不适应。“十年前，当他背着那卷散发着浓烈毛皮膻味的行李向‘上校’报到时，他真是除了谦逊什么都不懂。”“次仁因为跟这个巨大的城市格格不入而郁郁寡欢。”^②这些初来乍到“五迷三道”^③的北京藏人，像“傻呵呵天真可笑的小男孩”，像“从火星上下来的怪物”，又像“被人踹了几脚的丧家犬”。在小说中，次仁被戏称为“次人”，藏语中的“次仁”是长寿的意思，而在汉语中，“次人”是含有贬义的——或许是一种身份自嘲吧。十年来，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次人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个城市的节奏，“成为这个城市忙忙碌碌的一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②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③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员……在常人眼里，他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城市人了”^①。但次仁并没有因此轻松起来，他依然被这个耸立在他面前的巨大城市弄得焦头烂额。“次人觉得周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他的这帮小兄弟好像都已穿墙而过，结果却被弹回去得更远。”^②次仁以生病为由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但在家乡住了几天，就觉得无聊。家乡的天空太晴朗，空气太新鲜，没有公用电话可打，没了四面八方的信息，心空得厉害。他不喜欢都市生活，但相比家乡的单调，他还是决定回到都市。对移居者而言，适应似乎是暂时的，不适应则是恒久的。或许，他们只能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徘徊。无法融入，也不忍离去，像一个旅人。最初的不适应可能来自陌生的环境以及诸多陌生的关系，后来则是精神的不适应，心理的不适应，这是隐性的。从表面看，移居者谙熟都市，似乎已经消弭了作为“异乡人”的身份界限，而在精神层面上，他们是巧妙的模仿者和秘密的流浪人，身份界限是模糊的。无论怎样模仿，内心都是寂寞的。或许，人们可以走进一方地域，最终却无法走进彼此的心灵，只能踟蹰在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精神还乡的路上。故乡是焦头烂额时灵魂逃逸的寄托之所，而都市却是引诱他们又捉弄他们的女人。永久地回到故乡已不可能，而身处都市，又不免心无所居，身亦无所安。

这部小说之后，吉米平阶陆续创作了中篇小说《橡皮墙》《“119”次仁》《白玛和加利》《昨天的太阳》《洛桑其人》等，还有短篇小说《生命是在别处》《秋天的童话》等。这些小说都统一在“北京藏人”名下。这些人物或多或少带有《绿波带》中次仁的影子，虽然各有不同的经历、职业、面孔，但趋于一致的是，都有一种尴尬。短篇小说《生命是在别处》中的巴加，从北京的一所“培养各种奇妙文字”的著名学府毕业，被分配到研究所从事藏文翻译工作，“他一直怀抱一种来自高原的与众不同的信心，以至眉宇间都会闪闪发光”，他以本民族的精英自居，举止风度显得自信潇洒，并因此赢得了一位北京女子长达两年的爱情。在日益庸常的世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②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间，一个功不成、名不就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婚姻时是无法超越财富、地位、名利羁绊的。当精神的光环消失后，自信满满的巴加感到了无助、困惑和迷茫，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羽毛未丰的臭小子，一个在都市里既无地位又无钱的藏人”。开始时巴加将各种不适不如意归咎于这座城市：“他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但又快乐无忌的小孩变成了一片满目疮痍的荒原，他不知道如果他不进入这个城市会怎么样，但至少他不必忍受这恼人的炎热，不用在炎热的夏天像狗一样蜷缩在水泥地上吐着舌头喘息。”^①巴加请假回到了天高气爽的高原故乡，用清新的空气和青稞酒疗救疲惫的心灵。“对巴加来说，在老家的睡眠是酣畅的，因为没有蚊虫的袭扰，在老家的胃口是开放的，因为没有炎热的折磨。……巴加真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沧桑流落他乡的浪子，心头有千般无奈万般酸楚。”^②巴加决定辞去北京的差事，回老家找一份可人心意的工作，结束炎热的嘈杂的平庸的无奈的日子，过一种新鲜的充实的日子，一种清爽的日子。可当调令下来后，巴加却感到了失落。比起嘈杂的都市，家乡太安静了，巴加都有点不适应这种安静了。家乡的新工作是藏文古籍整理，“一天到晚读得满脑子古意，毫无新鲜感，加上刚刚回来的那股子新鲜劲儿已消失殆尽，就生出些倦意来”。回到家乡工作，并没有让他摆脱平庸感和无奈感，乡情、友情以及同胞（或同事）之情也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候，他会突然想起曾经生活多年的热闹的都市。“他知道自己现在找不到一个好的去处，他茫然地跟着人流沿着八廓街转圈，一圈又一圈，此刻，天上真有神灵，那他准会看到这个巨大滚动着的圆轮之中，有一个小小的人头上没有光圈，因为他不知道他汇入这个圆轮之中为了什么。”逃离都市的巴加，“心空落得一无所有”，“眉眼间显露着内心的脆弱和空虚”，他的灵魂“漫无边际四处漫游”。^③远离家乡后的归来对巴加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与所有漂泊他乡的移居者一样，巴加已经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究竟哪里才是精神的家园？生命的航船究竟应该在哪里停泊？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②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③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265页。

二

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中心。随着我国城市化地不断推进，各种地域文化、各种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不断地汇集到这里，不同文化在冲突中逐渐融合。北京汇聚了我国的各民族和不同人群，汉族虽然是北京的主体民族，但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北京都有居住，藏族只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把藏人在北京的生活看作少数民族在北京生活的一个缩影，进而也可以看作从天南地北来到北京工作生活的“外地人”生活的缩影。在风起云涌的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我国的人才流动、人口迁移已十分频繁，人们从乡村移居城市，从A地移居B地，已成为普遍现象，文化的碰撞交流越来越普遍。显然，这里强调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差别，而是由地理差别演化而来的文化心理差别。对移居者来说，新的家乡意味着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产生。可以说，吉米平阶笔下的北京藏人故事交织着民族性、地域性等多重的情智体验，透露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信息，在当下的中国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吉米平阶的作品来自他多年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的积累。作为少数民族成员，北京藏人从自己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陌生的异文化后，他们一方面面临着民族认同的困惑，另一方面面临着文化适应的考验，还面临着心理疏离感的困扰。但无论怎样，与诸多移居北京的“异乡人”一样，北京藏人无可避免地要经受城市化、现代化的洗礼而被纳入北京多元文化格局之中，从异质文化的夹缝中走出来，进入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的世界。在吉米平阶后来的小说《橡皮墙》和《“119”次仁》中，主人公看起来已经“汉兮兮的”^①，成为“在藏族中像汉族并且在汉族堆里生活的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藏人”^①，他们已经磨炼出在多元文化之间的生存经验，从单一坚守走向双向融合。北京藏人日益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城市身份使其地域特征渐趋淡化，变得越来越“北京化”。但雪域高原一直是他们时时回望的故乡，藏文化无疑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北京生活多年后，吉米平阶选择了到拉萨工作，他说：“西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使我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似乎有了生活的依靠。西藏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受到了自己情感深处的那种本真秉性，那是我内心最为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喜欢上了西藏这块独特的地域。”^②

据相关调查显示，现实生活中的北京藏人主要集中在涉藏单位，从事涉藏职业，扮演着传播藏文化的角色，发挥着联系藏区与内地以及海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也就是说，北京藏人虽然远离家乡，却并没有远离藏文化，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与藏文化更为贴近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了。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北京藏人必然会随着北京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渐确立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视界。北京藏人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大学本科以上，其中藏学研究人员在北京藏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北京的藏族硕士、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的数量是全国最多的。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的藏族聚居区（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包括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方言区。这些藏人中的文化精英必然会对藏汉文化之间的相互认知与交流发生重大影响。藏人到北京生活，必然会有各种不适应，与内地人到青藏高原会有“高原反应”一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人到了北京，也会有“平原反应”和“都市反应”，如地理环境、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在各种不适应中，有的人逃离了都市，但更多的人适应了在北京生活，或者选取了折中或调和策略。虽然在北京工作，但家乡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每当他在北京受了什么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的心可以逃到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② 胡沛萍：《吉米平阶访谈录》，《西藏文学》2017年第1期。

那里”，“有故乡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北京待烦了可以来走走”^①。北京藏人在北京的居住是“大分散，小聚居”，“为了克服心理方面的冲击，北京藏族往往会通过同乡聚会、同族聚会和联谊会等形式相互建立起各种联系，有的甚至聚族而居、聚族为业，从而在同一族群中找到亲情、友情和温情”^②。为了对付北京夏季的炎热、酷暑和蚊虫，“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夏季都利用各种机会到藏区出差或进行实地考察，或将探亲的假期安排在夏季，全家人回家乡省亲避暑”^③。这种适应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藏地三区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打破了藏语方言界限，沟通了藏区与内地以及海外的联系，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扩大了藏文化的影响力，淡化了传统性，提升了现代性，开阔了视野，培养了藏人更加开放的意识，增进了汉族及其他民族对藏族、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④从客观上讲，这种适应是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适应，从主观上讲，则是出于生存需要的本能选择。在物质生存层面，北京藏人的生活似乎与其他漂泊北京的人们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有各种困扰却能积极努力不断适应，而在精神生活层面，移居者会游离于现实之外，会隐形，会有拒绝排斥或各种周旋，他们往往穿梭于精神所构筑的世界，仿佛生活在别处。

三

生存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毋庸讳言，无论在哪里生活，无论在做什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物质生存状况的改善才是最坚实的保障。财富，权力，名位，这些个体生存与发展中无法忽视的东西往往

① 杜永彬：《都市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以北京的藏族为例》，《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② 杜永彬：《都市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以北京的藏族为例》，《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③ 杜永彬：《都市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以北京的藏族为例》，《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④ 杜永彬：《都市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以北京的藏族为例》，《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是诸多精神困惑的根由之一。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不久的青年人，尽管精神上存在着诸多困扰，但更大的困扰来自物质生活的困顿以及面对现实生存的无力感，比如住房，比如爱情、婚姻等，而物质生活的困顿又会加剧精神上的飘零感。在躁动的青春里，在充满诱惑的都市里，这些漂泊北京的饮食男女，每天为了自己那一点点欲望在奔波、在苦恼、在欣喜、在悲伤、在沉醉、在错乱、在抓狂。这样的情形在初入社会的青年人身上具有普遍性，不管在哪一片天空下，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吉米平阶写出了一种生存的事实，司空见惯的故事中流宕着结实的悲悯与爱。《秋天的童话》中的丹增，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发财梦和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对医药知识一无所知，却想利用藏医藏药在内地的名气，与人合伙鼓捣出一个“藏式保健口服液”以牟取暴利。结果，愚人者为人所愚。在活佛眼里，丹增是个“被自己所苦的人”，劝他“命里没有的不要去强求”，并赠给被欲望扣住了双眼的丹增两句话：“浊时眼界短，障除恍然明。”整个故事像一出轻喜剧，是讽世之作，蕴含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而掩映在故事背后的却是复杂的世相和更为复杂的人性。《白马和加利》中的“白马和加利是远房表亲，都来自一个叫甘孜的小城镇”，两人“一起读小学、中学和大学，毕业后又共同分在京城供职”，近一两年，又“各自谈了朋友”，“又忙着扒钱”，乍看起来，这两个朝气蓬勃、活力四溢的年轻人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没有次仁的孤独茫然，也不像桑那样“更像一个漂浮在过去的幽灵或者翻飞在将来的燕子”就是不肯直面现实。因为歌唱得好而在一次偶然中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并挣了一笔小钱，由此诱发了白马和加利发财致富出名的欲望，在对演艺圈的情形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随草台班子南下演出获得成功，在鲜花和掌声中收获了不菲的报酬，成功演绎了在大城市孤独的小人物梦想成真的故事。但对此时此刻晕晕乎乎的白马和加利来说，生活是残酷的，没有多久，他们的报酬被收缴，又因为外出演出而被单位开除。他们“成了两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两个被女人一脚蹬掉的倒霉鬼和前途未卜的失业者”，“在涌动的人流中，他们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跟满街同样像心事重重

的人流有所不同”。^①《有个弟弟是活佛》中，“降措所在的单位是专搞藏族历史研究的，虽然不是清一色的藏人，但各色人都在这里耳濡目染久了，都藏味十足，当然，这也包括对佛的景仰，尤其是那些历史书，篇篇都有个佛在里头”。降措的弟弟被选定为活佛，降措成了活佛的哥哥，由此降措平淡的生活生出异样的光彩来，他的命运也由此改观。春风得意的降措“对藏文化越来越有信心了”。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关于世态炎凉的故事，是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但骨子里是关于文化和信仰的秘密。《远近风景》讲述了国吉与父亲旺堆两代人的故事：“旺堆在土改后从寺庙还俗回来，三十多岁才成家，得了这么个没妈的孩子，他把他当成佛爷赐给他的唯一宝物，用尽全部力气拉扯着国吉长大，还让他在县城马马虎虎念完了中学，算是给草原上养了一个识字的牧人。旺堆是一个很出色的牛场娃。国吉也是一个出色的牛场娃。两年前，一个‘富’字像草原五月的风，吹醒了草原人久已沉寂的热情。旺堆包下了队上的牦牛群。”^②“当初，儿子鼓动他包下牛群后，他的心乱跳了好几天，念了几百遍六字真言，还专门向菩萨问了一卦。”对国吉而言，城里的生活充满诱惑。国吉“经常从县城里带来一些撩拨人心的消息。他去县城里驮茶叶和盐巴，卖鲜奶子和酸奶子”。国吉想卖掉牛群做生意，挣更多的钱。为此，旺堆不无担忧：“佛说世上的钱财是取不尽的，每个人只有自己的一份。我们又卖奶子又收驮脚费，该不会有麻烦吧？”^③旺堆舍不得卖掉牛群，舍不得离开草原，他已经习惯了草原上简单的游牧生活。这里的羌若草原水草丰美，这里有美好的自然，在这里，他生活得心安理得。然而，“致富风”除了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更多的是勾起了人们内心深处难得满足的欲望。在“高原透明的星空下”，国吉满脑子都是发财梦，他做梦都向往城里的生活。从表面看，《远近风景》讲述的是国吉与父亲旺堆脱贫致富的故事。就深层意蕴而言，小说彰显了人类难以遏制的欲望和面对诱惑时的难以抗拒。旺堆安于游牧生活，体现了源于传统生活方式的理性与克制，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51页。

②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③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传统生活方式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遗传因子——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以及知足常乐的心理价值取向。但对于生机勃勃、积极进取的青年牧人国吉而言，城市象征着各种诱惑。国吉“完全被城里的生活吸引住了”。“他很瞧不起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牛场娃，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另一种生活圈子里的人。喝甜茶，搂着姑娘跳舞。这些都需要钱。”^①“国吉发了虫草财。”“可是国吉越来越让旺堆受不了了。他也学会了城里人那一套，脱了袍子穿起了军干服；把打酥油剩下的酸水往送甜茶馆的奶子里掺；酸奶也做得稀稀的。”^②城市化意味着市民化、市民主义。面对变化中的文化、有缺陷的社会、以欲望为主导的日常生活，城市似乎成了传统道德的沦陷区。现代性总是和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密不可分，今天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吸引力和诱惑的生产。人们穿行于世界或者与世界擦肩而过的时候，究竟是为了生存而消费，还是为了消费而生存？“生活在从一种吸引到另一种吸引，从一种诱感到另一种诱惑，从嗅出一种珍馐到另一种珍馐，从吞下一种诱饵到四处寻觅另一种诱饵之中……每一次的吸引、诱惑、珍馐和诱饵都是新的，不同的，而且比上一次更加夺人心魂。”^③在这个层面上，贫穷是不可能被“治愈”的。人们在追求物欲的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远离精神的家园。庄子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心为物役”，就像一个人从小就离开了家而忘了回去。在小说里，游牧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无疑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愿望。吉米平阶有一首题为《游牧》的诗，写得纯净、古朴、悠远：

水草丰美的草地在远方
滋养牛群的盐湖在远方
抵御冬天的帐篷在远方
撩拨情欲的女人在远方

这里只有云在地上的影子

①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1页。